

• 老龄经济 •

子女务工时代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与农村家庭养老

刘红升¹, 刘利鸽²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要: 分析了成年子女外出务工时代农村家庭养老问题, 探讨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研究发现: 农村老年人面临的经济支持弱化、生活照料缺失、精神慰藉匮乏等家庭养老问题, 均受到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的影响;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特色产业发展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影响农村家庭养老——增加有劳动能力老年人的自身劳动收入, 直接改善家庭经济支持状况; 留住子女就地就近就业或吸引外出务工子女返乡就业, 综合改善家庭养老状况; 进行乡风文明建设, 传承孝道文化, 间接改善农村家庭养老。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 特色产业发展; 农村家庭养老

中图分类号: C913.68; D66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898(2021)06-0045-11

Family Elderca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ty Industries in Rural China Where Young People Migrate for Work

LIU Hongsheng¹, LIU Lige²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Shaanxi Province,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Shaanx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issues related to family eldercare in rural China where young people migrate for work, and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specialty industries on rural family care. It is found that weakening financial support, lack of daily care and absence of spiritual comfort confronted by rural older people are all resulted from their children's migration. Against the

收稿日期: 2021-02-18; 修订日期: 2021-04-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公婆-儿媳代际互动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研究”(16CRK009)。

作者简介: 刘红升(1977—), 河南新郑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刘利鸽(1981—), 河南许昌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

background of rural vit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ty industries affects rural family care mainly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ways. Firstly, increasing income of older adults with the ability to work and directly improving their family support. Secondly, attracting young people to work in situ or return home,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rural family care. Thirdly, promoting rural civilization and filial piety, indirectly improving family eldercare in rural China.

Key words: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development of specialty industries; rural family eldercare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关键阶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并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由于受到城镇化和人口流动的冲击，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城乡倒置”特征，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更深、速度更快，老年人口更多（林宝，2018）。如何有效应对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成为政府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它既关乎农村老年人福祉和农村家庭发展，也关乎农村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

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社会养老是农村地区三种主要养老模式（单奕，2017），在社会养老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后代养老）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现实的养老模式（高瑞琴 等，2017），是大多数农村老年人的第一养老选择（梁丽霞，2015），是农村地区的主流养老模式。然而，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致使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面临严峻的挑战。劳动力大规模外迁不仅加速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而且对农村家庭养老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学勇 等，2014）。伴随日益明显的农村家庭小型化、空巢化趋势，因受到家庭规模和结构变化的冲击，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已经出现全面弱化（于长永 等，2017），并成为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面临突出问题的主要表现之一（陆杰华 等，2019）。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导致农村家庭养老陷入困境，情感关怀不足和生活照料缺失是农村老年人面临的养老难题（谷玉良，2018）。“伦理转向”导致家庭资源代际分配遵循“下位优先”原则，进而使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资源供给不足（狄金华 等，2016）。此外，农村家庭中以户为决策单位、以后代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的子代主导型生存策略，也可能加大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风险（李磊 等，2015）。可见：在人口老龄化、子女外出务工常态化、家庭代际生态不佳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已绝非单纯的私人事务或家庭事务，而是社会公共事务；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或面临难以满足的风险，从而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与城乡协调发展。关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提高农村家庭的养老质量，保障农村老年人的福利水平，是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内在要求和重大

任务。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和关键,是解决农村社会发展问题的基础和保障。201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繁荣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201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又明确作出部署,要求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倡导“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支持建设一批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和系列政策文件为新时代积极应对农村老龄化、破解农村养老难题、引导农村老年人积极养老和“老有所为”等提供了政策支持。

此外,家庭养老仍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主流养老方式,孝道是家庭养老的传统文化基础。然而,近年来孝道在我国农村地区处于日趋式微与衰落的窘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这为新时代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切实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对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这些都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和孝道文化传承的重大关切。

在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在子女外出务工常态化以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与农村家庭养老的关系,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廖柳文等(2018)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人口现象,对于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社会保障、乡村治理、消费结构、土地利用和生态空间等诸多方面都有重大影响。杜鹏等(2019)指出,乡村振兴战略为破解农村养老困局和健全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但学界目前尚未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探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与农村家庭养老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

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首先分析成年子女外出务工时代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问题,然后阐释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农村家庭养老。希望由此拓展农村家庭养老的研究视角,识别特色产业发展给农村家庭养老所带来的机遇,从而为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综合治理城乡发展不平衡提供理论支持。

二、成年子女外出务工时代的农村家庭养老问题

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主要维度,已有研究也多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已经全面弱化,并且不同维度农村家庭养老的弱化程度有所不同(于长永等,2017),农村家庭养老的脆弱性问题日益严峻,中高等养老脆弱性家庭占比达到51.81%(徐洁等,2019)。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后农村老年人面临着经济供给不足、生活照料缺失、精神慰藉匮乏三大养老难题(曲延春等,2019)。不同维度农村家庭养老的弱化程度差异明显:精神慰藉弱化程度最大,经济支持弱

化程度次之，生活照料弱化程度最小（于长永 等，2017）。特别是，农村老年人面临较大的生活照料风险，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们普遍缺少日常生活照料，另一方面表现在患病期间照料缺失的情况较为严重（贺聪志 等，2010）。从某种程度上说，与经济支持相比，精神慰藉更能体现孝道的本质与内涵（方菲，2009），是最高层级的养老维度。然而，随着成年子女大量外流、传统孝道不断衰落、家庭权力代际下移，家庭的情感支持常常被忽视（陈芳 等，2014）。可见，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面临经济支持弱化、生活照料缺失、精神慰藉匮乏等多重困境，亟须揭示原因、探寻出路。

绝大部分已有研究是从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的视角分析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问题，认为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养老具有多重影响。

子女外出务工对经济支持的影响。张文娟（2012）通过研究发现，尽管子女外出务工能改善其经济状况，提高其经济支持能力，但是他们与流入地社会的融合却削弱了原本怀有的养老意愿。这意味着，农村老年人实际上可以获得的经济支持受限于子女在流入地社会的融合情况。梁海艳 等（2016）认为，子女外出务工能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对于是否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以及支持数量，均有正向促进效应。高建新 等（2012）通过比较子女外出务工影响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性别差异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养老分工有着显著影响，并且儿子和女儿外出务工对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当儿子全部外出务工时，子女倾向于不平均分担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当女儿全部外出务工时，子女倾向于平均分担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宋璐 等（2008）的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未能对农村家庭养老的性别分工产生根本性影响，但子女养老支持的性别差异却呈现出弱化态势，外出务工的女儿更有可能增加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子女外出务工对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认为：子女外出务工导致农村老年人获得的养老照料减少及家庭成员的安全风险增大（刘军奎，2019）；随着外出务工的儿子增加，他们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的概率更低，从而使子女在生活照料上的性别分工差异弱化（宋璐 等，2008）；当儿子或女儿全部外出务工时，子女都倾向于不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高建新 等，2012）；虽然子女外出务工导致父母面临生活照料缺乏，但是婚姻挤压背景下部分成年儿子被迫大龄失婚，改变了传统农村家庭养老的性别结构，大龄未婚儿子承担了本该由儿媳承担的生活照料责任（靳小怡 等，2014）；子女外出务工致使父母的劳动负担和生活照料任务加重（梁海艳 等，2016）。总之，子女外出务工直接导致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尚不完善的背景下，改变成年子女流动模式和就业模式，或是满足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需求的一种较好方式。

子女外出务工对精神慰藉的影响。于长永 等（2017）认为，子女外出务工虽然弱化了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但促进了对父母的精神慰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促进了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实现。梁海艳 等（2016）认为，虽然子女外出务工减少了子女与父母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和互动，但是坚信自己与子女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的老人仍然占据多数，他们不会因为子女外出务工而感觉其与自己不亲近或不孝顺自己。宋璐 等（2008）通过研究发现，外出务

工使女儿对父母增加情感支持的可能性更大, 儿子和女儿在代际情感交流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扩大。此外, 尽管大龄未婚儿子承担了本应该由儿媳承担的生活照料责任, 但其依旧难以弥补因失婚而给父母造成的情感压力(靳小怡等, 2014)。

综上可知, 在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 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多重困境, 子女外出务工是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重要原因, 对不同维度农村家庭养老有不同的影响。这也意味着, 改变子女外出务工模式可能是破解农村家庭养老难题的重要途径。

三、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影响农村家庭养老的理论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提供了重要契机, 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有望突破农村家庭养老困境。然而, 当前尚未发现用于解释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影响农村家庭养老的理论框架。不过, 相关学者的零星观点和已有研究的部分发现, 依然从不同层面或角度初步揭示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首先, 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会影响农村家庭养老。舒奋(2019)认为, 农业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社会体制、社会政策取向、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 在农村养老方式的形成、发展与转变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特色产业的发展可能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方式; 作为农村老年人最为重要的养老方式, 家庭养老的外部宏观环境将会发生改变。

其次, 人口流动通过影响家庭结构进而影响家庭养老功能。长期以来, 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乡村向城镇大规模流动, 农村家庭的结构因成员两地分居而遭到破坏, 进而出现代际关系的结构失衡、角色错位、内容复杂化, 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出现了独居化、空巢化和隔代化的趋势(孙鹃娟, 2010)。青壮年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出直接影响农村家庭结构, 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明显, 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老龄化严重, 代际分离现象普遍, 代际关系遭到破坏, 养老传统基础被削弱(李俊霞, 2017)。可见, 在其他养老模式尚不健全的情况下, 青壮年人口大规模外出务工是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直接原因。所以, 引导青壮年人口回流, 成为改善农村家庭养老的前提和关键。

再次, 代际关系是家庭养老的核心内容, 而家庭现代化严重冲击着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 在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传统家庭的代际关系会受到空前的冲击;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核心化趋势日益明显, 父辈对子辈的管控在不断弱化; 人口乡城流动、社会福利发展、文化价值变迁等, 均在朝着不利于农村老年人的方向演变(钟涨宝等, 2014)。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和特色产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可能会面临新的冲击(尤其是外出务工子女可能因被乡村新增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吸引而携带着新的思想、观念、习惯、行为模式、经验和技能返回家乡所产生的冲击), 进而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

最后, 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机制模型认为, 家庭养老环境和家庭养老政策会影响家庭养老功能。具体而言: 家庭养老功能主要涉及家庭养老观念、家庭养老能力和家庭养老策略; 家庭养老环境主要包括子女规模、年龄构成、养老观念、职业收入, 家庭少子化、老龄化、

观念转变、家庭与事业冲突，是家庭养老环境的现实特征，其与家庭养老政策共同影响家庭养老功能（李连友 等，2019）。子女外出务工或返乡均会影响农村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依赖的子女数。对于老年父母而言，子女外出务工或返乡既会改变家庭年龄结构，也会改变家庭养老观念，还会改变家庭收入状况。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政策支持，进而有望更好地发挥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

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影响农村家庭养老的路径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看，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已经陆续出台多项支持性政策，使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不断得到完善。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战略的科学性、政策的支持性，使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影响农村家庭养老具有可能性。从中微观层面来看，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伴随着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农村人口流动模式和就业模式将发生转变，农村家庭结构和居住方式将有别于成年子女异地流动和异地就业模式下的家庭结构和居住方式。这势必带来家庭养老或代际关系的变化。具体而言，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可能通过三条路径影响农村家庭养老。

第一，通过增加有劳动能力老年人的自身劳动收入，直接改善其家庭经济支持状况。中国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其重点和难点在农村，乡村振兴战略是这一重点和难点能否突破的关键。乡村振兴战略务必以农民为主体，以老人农业为基础，以为老人农业提供服务为重点（贺雪峰，2018）。相比较而言，农村人口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农村老年人口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更少；但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可以通过自我劳动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己的养老需求（印子，2017）。那些既有劳动意愿又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老年人可以充分发挥其在农业生产方面经验丰富的优势，并借助政策扶持和技术支持，从事特色农业劳动，增加自我劳动收入。在具体实践中，可依托农村集体土地制度，让农村老年人与土地结合，形成老人农业（贺雪峰，2019）。这样既有利于促进乡村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从而缓解农村养老压力。

与此同时，随着乡村特色产业的不断发展，农村老年人在本村或就近就业的机会均有望增多。相较于无特色产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使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老年人参与劳动并从中受益的机会更大；无论是从事特色农业生产劳动，还是从事其他特色产业生产劳动，都既有利于农村老年人发挥余热，实现“老有所为”，又有利于农村老年人增加自我劳动收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实现“老有所养”（刘利鸽 等，2020）。

第二，通过留住子女就地就近就业或者吸引外出务工子女返乡就业，综合改善家庭养老状况。在现实中，成年子女的流迁方式及其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社会经济背景，均会对其养老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张文娟，2012）。这意味着，远距离异地流迁和近距离就地就近流迁，会对成年子女的养老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尽管我国惠农强农的政策体系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建立，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生活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但因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尚未出现根本改变（高芸 等，2011），其结果是，农村家庭养老难题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破解。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以来,伴随着就地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正在发生转变,大批外出务工人员开始离城返乡。返乡创业或就业的农民工正在与日俱增,并逐渐发展为就地城镇化的核心力量(杜丽华,2015)。农民工回流改变了我国人口长期以来从内陆向沿海流迁的单一模式,并且为回流地区实现就地城镇化带来了新动力(张甜等,2017)。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受到相关战略规划和扶持政策的积极影响,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正在不断增多,发展空间变得越来越大。这既有利于留住尚未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也有利于吸引已经外出务工的人员返乡,从而为突破农村家庭的养老困境提供可能。

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就近就地城镇化可以降低城镇化成本,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助推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李强等,2015),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生计资本(杜巍等,2018)。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将进一步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改善农村居民生计状况。而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及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高芸等,2011),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越小,流动距离越近。这意味着,流出地农村的经济社会背景可能通过吸引外出务工子女返乡就业创业,进而影响其家庭养老行为。

子女就地就近就业和外出务工子女返乡就业创业,既是流动距离和流动模式的转变,也是就业模式和居住方式的转变,均会带来农村家庭的规模、结构与功能的转变,进而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慰藉状况。

经济支持方面。农村老年父母与外出务工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支持往往遵循合作群体模型,经济支持主要从外出务工子女流向老年父母,老年父母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支持,他们还因向留守未成年孙子女提供了生活照料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张烨霞等,2008)。尽管外出务工子女回流以后可能会面临收入减少的风险,但是他们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却未明显减少,而是总体持平或是略有增加,人力资本对经济支持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放等,2019)。可见,外出务工子女返乡就业或创业有望增加其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毕竟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就业增收机会,增强了其家庭经济支持能力。

生活照料方面。就业状况、外出务工时长、家庭亲子关系和家庭生命周期,会共同影响外出务工子女照顾老年父母的方式与质量(刘捷玉等,2019)。由于子女外出务工以及老年人留守农村,就业模式和居住方式相继发生改变,这导致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资源减少。特别是,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后,原本由其承担的照料老年父母的责任便向留守的父母自己和其他未外出子女转移,从而加重了当前生活照料者的劳动负担(贺聪志等,2010)。同时,虽然子女外出务工增加了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但是也增加了父母承担隔代照料的概率,从而不利于父母的身心健康(温兴祥等,2016)。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有望吸引外出务工子女回流。相较于异地务工,就地就近务工有望增加子女向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老年人自我照料和照料孙子女的负担有望减轻,安全和健康风险有望降低。李放等(2019)通过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子女回流后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已经呈现出明显增加的趋势,这为上述观点提

供了有力证据。此外，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的满足程度越好，子女探望父母的频率越大，农村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将越小（姚兆余等，2018）。这有利于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的供给压力。

精神慰藉方面。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会直接导致农村老年人缺乏精神慰藉，从而更容易遭遇健康风险。随着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就业岗位越来越多，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子女就地就近就业者越来越多，外出务工子女返乡就业者也将越来越多。相较于异地远距离务工，就地就近务工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更小，交流互动更容易，交互频率更大，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的精神慰藉也可能更多。农民工回流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尽管这一促进作用的大小目前尚为有限（李放等，2019）。这说明，外出务工子女返乡有利于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状况。此外，对于那些仍然参与劳动和可能参与劳动的老年人，自身劳动收入的增加使子女经济支持的负担减轻，这可能会减轻亲子双方的经济压力，并改善老人的精神状态，从而实现“老有所乐”。

不过，子女外出务工使得家庭养老模式发生转变，传统上依靠儿子养老的模式受到冲击，女儿在养老方面发挥的作用有所增强（左冬梅等，2011）。尽管农村家庭养老的性别分工模式目前尚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但是子女养老行为的性别差异正在弱化，女儿的家庭养老能力、养老意愿和养老作用正在增强（宋璐等，2008；聂焱，2011）。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可能通过吸引外出务工子女返乡就业创业来增加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但也同样可能增大未外出务工子女（尤其是女儿）就地就近务工的可能性，其对老年父母的精神慰藉相应减少，这使得农村老年人可获得的精神慰藉在整体上呈现出不确定性。

第三，通过乡风文明建设和孝道文化传承，间接改善农村家庭养老。当前，我国农村的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农村养老体系尚不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较为落后，传统养老观念日趋式微，这些导致我国农村老年人更容易身陷养老困境（曲延春等，2019）。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特别强调了乡风文明建设和孝道观念传承，以助推农村社会全面发展。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孝道是农村家庭养老的文化基础。201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对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乡风文明建设离不开稳固的物质基础，只有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才能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徐学庆，2018），奠定孝道文化传承的经济基石，进而为子女的养老意愿转换为养老行为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可以留住青壮年劳动力。只有越来越多的成年子女生活和工作于农村，才能逐渐培育尊老敬老的农村社区文化，并且影响更多的未成年子女，从而传承尊老敬老文化和孝道观念，提升农村家庭养老水平，增进农村老年人福利。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当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提供了重大契机。大力发展战略特色产业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它为突破农村家庭养老困局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基本

思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将不断提升。那些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农村老年人通过参与以特色农业为主的特色产业发展, 直接增加自身劳动收入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实现“老有所为”和“老有所养”。那些未曾外出务工的成年子女在本村或附近乡村就地就近就业的机会将越来越多, 他们通过从事特色产业发展劳动实现增收也将成为可能, 农村老年人获得子女更多经济支持也相应变得更容易。那些已经外出务工的成年子女回流返乡就业创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将越来越大。尽管他们可能会面临经济收入减少的风险, 但回流返乡就业创业有利于增加对老人的生活照料, 有利于增强与老人的情感互动, 有利于缓解先前异地分居所致的各种问题, 从而提升家庭养老的整体水平。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与振兴, 为乡风文明建设和孝道文化传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使得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拥有良好的生长土壤与环境, 进而助推农村家庭养老走出困境。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 国家层面: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优化; 倡导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制度, 为农村老年人养老提供制度性保障和全方位支持。

第二, 省级行政区层面: 坚决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结合当地具体情况, 做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健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体系, 加大对资金、技术、人才、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提高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 着重完善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体系, 探索符合当地情况的社区养老模式, 强化多元社会养老保障功能, 更好地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

第三, 乡镇层面: 积极响应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号召, 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 甄选优势特色产业, 培育新型特色产业,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增加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 并通过增强农村的吸引力, 转变农村人口流动模式, 增进农村家庭代际团结。

第四, 村庄层面: 积极宣传孝道文化, 强调家庭的赡养责任, 引导人们改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 发挥女儿养老的独特优势, 弘扬现代孝道观念,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 通过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积极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缓解农村家庭养老问题, 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 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参考文献:

- 陈芳, 方长春, 2014. 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出路: 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研究[J]. 人口与发展 (1) : 99-106.
- 狄金华, 郑丹丹, 2016. 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J]. 社会 (1) : 186-212.
- 杜丽华, 2015. 就地城镇化背景下返乡农民工创业探究[J]. 农业经济 (12) : 80-81.
- 杜鹏, 王永梅, 2019.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机遇、挑战及应对[J]. 河北学刊 (4) : 172-178+184.

- 杜巍, 顾东东, 王琦, 等, 2018. 就地就近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生计资本的测算与分析[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 : 60-68.
- 方菲, 2009. 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慰藉问题探讨[J]. 农村经济 (3) : 107-110.
- 高建新, 李树苗, 左冬梅, 2012. 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分工影响研究[J]. 南方人口 (2) : 74-80.
- 高瑞琴, 叶敬忠, 2017. 生命价值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的供养制度[J]. 人口研究 (2) : 30-41.
- 高芸, 李贺, 2011. 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活环境对流动决策的影响[J]. 中国农学通报 (17) : 151-157.
- 谷玉良, 2018. 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 : 114-122.
- 贺聪志, 叶敬忠, 2010.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3) : 46-53+111.
- 贺雪峰, 2018. 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 1-5+90.
- 贺雪峰, 2019. 如何应对农村老龄化: 关于建立农村互助养老的设想[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 : 58-65.
- 靳小怡, 郭秋菊, 崔烨, 2014. 转型期的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对代际关系的影响[J]. 青年研究 (4) : 28-38+94-95.
- 李放, 张瑞霞, 沈苏燕, 2019. 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对农村老人养老的影响[J]. 江汉学术 (4) : 17-26.
- 李俊霞, 2017. 人口大规模流出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数据[J]. 农村经济 (11) : 96-102.
- 李磊, 俞宁, 2015. 人口流动、代际生态与乡村民俗文化变迁: 农村新生代影响乡村民俗文化变迁的逻辑路径 [J]. 山东社会科学 (11) : 97-101.
- 李连友, 李磊, 邓依伊, 2019. 中国家庭养老公共政策的重构: 基于家庭养老功能变迁与发展的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 (10) : 112-119.
- 李强, 陈振华, 张莹, 2015. 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J]. 广东社会科学 (1) : 186-199.
- 李学勇, 廖冲绪, 2014. 农村留守家庭的代际和谐初探[J]. 农村经济 (12) : 69-73.
- 梁海艳, 代燕, 2016. 农村人口流动对代际互动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11) : 72-77.
- 梁丽霞, 2015. 农村家庭养老失能状况分析及复能策略探讨[J]. 山东社会科学 (10) : 184-188.
- 廖柳文, 高晓路, 2018. 人口老龄化对乡村发展影响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5) : 617-626.
- 林宝, 2018.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 普遍性与阶段性[J]. 人口研究 (3) : 38-50.
- 刘捷玉, 余家庆, 2019.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现状: 人口流动下的家庭照顾循环[J]. 开放时代 (1) : 179-193+7.
- 刘军奎, 2019. 人口流动导引的家庭代价及发展省思: 基于陇东南 Q 村的个案考察[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 : 46-58.
- 刘利鸽, 包智俊, 刘红升, 2020. “老有所依”抑或“劳有所依”: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视角下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研究[J]. 宁夏社会科学 (4) : 94-104.
- 陆杰华, 沙迪, 2019. 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矛盾与战略路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 : 78-87+2.
- 聂焱, 2011. 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女儿养老的影响[J]. 当代经济 (1) : 36-38.
- 曲延春, 阎晓涵, 2019. 晚年何以幸福: 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困境及其治理[J]. 理论探讨 (2) : 172-176.
- 单奕, 2017. 新经济时代下农村养老方式探寻[J]. 农业经济 (12) : 107-109.
- 舒奋, 2019. 从家庭养老到社会养老: 新中国 70 年农村养老方式变迁[J]. 浙江社会科学 (6) : 83-91+157-158.

- 宋璐, 李树苗, 2008. 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 10-21.
- 孙鹃娟, 2010. 成年子女外出状况及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J]. 人口学刊 (1): 28-33.
- 温兴祥, 肖书康, 温雪, 2016. 子女外出对农村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5): 64-73.
- 徐洁, 李树苗, 吴正, 等, 2019. 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评估: 基于安徽农村地区的实证研究[J]. 人口研究 (1): 91-101.
- 徐学庆, 2018.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意义及其路径[J]. 中州学刊 (9): 71-76.
- 姚兆余, 陈日胜, 蒋浩君, 2018. 家庭类型、代际关系与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6): 34-42+155-156.
- 印子, 2017. 优势视角下农村养老需要及其自组织满足[J]. 中州学刊 (9): 79-84.
- 于长永, 代志明, 马瑞丽, 2017. 现实与预期: 农村家庭养老弱化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 54-67.
- 张甜, 朱宇, 林李月, 2017. 就地城镇化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居住区位选择: 以河南省永城市为例[J]. 经济地理 (4): 84-91.
- 张文娟, 2012. 成年子女的流动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分析[J]. 人口研究 (3): 68-80.
- 张烨霞, 李树苗, 靳小怡, 2008. 农村三代家庭中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 (1): 8-15+124.
- 钟涨宝, 冯华超, 2014. 现代化与代际关系变动[J]. 天府新论 (1): 115-121.
- 左冬梅, 李树苗, 2011.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 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J]. 公共管理学报 (2): 93-100+127.

[责任编辑: 魏彦彦]